

# 历史迁流中的固执信念

——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有感

○ 黄卓越



90年代以来,一个为历史冷落多年的名字再次受到人们目光的亲抚,然而,陈寅恪及其事迹之成为“热点”并不像其他新闻对象那样及于更为广泛的传播区域,它主要仍限于那些学者型知识分子圈之中。这既在于陈寅恪的学问与体验的内容本身所携的艰涩性,阻隔了与广泛阅读之间的某种联系,另一方面,他的已逝的经历又极富代表性地包含了以学术与思想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所欲解决的中心问题,即如何抉择自己工作模式与维护知识信念体系的问题。就后一点而言,当然也与90年代后时风变迁及其在知识分子身上激起剧烈的感喟,进而是新一轮历史反思轨迹的趋于深入及反思角度的发生变化等有着密切的关联。

作为一种历史性符号,陈寅恪的个人际遇无疑地包含了可供学者们进行丰富诠释的多方面内容。从已发表的文章与著述看,一般论者或者在他身上寻绎正在日趋跌落的文化人格、文化精神,并通过对之的阐扬而进一步明确不可懈怠的历史载负,或者追慕他天才造诣所达到的国学成就,以建树可能重新比攀的学术准衡,或者发掘蕴结于那些凄迷典籍与诗词中的孤怀遗恨,揭櫫其文化遗民对百年沧桑、兴衰废存的感慨所

系等等。而无论何种诠释,由当代的意义上看,都未离开或说是可信地印证了陈寅恪寓言所属的时代性与类属性特征。虽然其中

也存在着若干误释的成分,但它之成为当代学术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一种足资仰慕的典范,似的确早已隐埋在这一事实符号的原始肌脉之中。

相比较而言,陆健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以下简称《20年》)是较为完整地以另一种方式与从另一个角度来挖掘陈寅恪内在魅力的一部新著。它当然也在多重着色中包含了以上各种成分,但它的重心却转移到传主与当时政治的更为广阔、也更为具体的互动、掣肘之中。该书在读界的成功,并非如一些论者所云应归之于传主本身的特殊经历,也有赖于作者作为一个历史簿录员“不隐恶”的可贵胆识,及由书中可见的对传主生平事迹由大量内部档案直至当年护理护士的口述的碧落黄泉的艰辛搜访,有赖于作者行文之间

池塘、岩石比以往更可亲，  
 撞击在岩石上而鸣叫。  
 它撞击是因为欢欣，  
 然后便轻轻跳跃上去了。

整首诗前面十几行为一个整体,充满春雨般的欢欣,可是,路翎最后只用一行单列一段就突然结束了全诗:冬天的时候在泥土与树的洞窟中。在我看来,整首诗,因为有了最后这一句,才于突兀中显出了诗的张力。生命在这里形成苦难与幸福、压抑与自由的映照与连结。读到这里,我仿佛触摸到了路翎飞翔的灵魂。

如果将也收入本书的路翎写于1948年的长诗《致中国》,和他晚年的这些诗作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差异。长诗充满着理性的思考和呐喊,具备另外一种力量。但是,很明显,这种诗歌的震撼力产生于叙述

方式,而非晚年这种对意象的发现。也许可以说,晚年路翎更像一个沉迷冥想的诗人,而非年轻时那个充满激情的诗人。

读路翎晚年的诗,总是可以感受到路翎内心强烈的渴望。他是否仍在留恋地回想以往创作力旺盛的日子?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属于一个新的时代?我这只是一种猜想和假设,因为,在路翎的精神世界里,有我们难以透彻理解的东西。其实,我们很难与他对话。

但是,诗是一座桥梁。

(此文是李辉为张业松、徐朗编选的《像是要飞翔起来——路翎晚年作品集》写的序,将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列入“20世纪文学备忘录”丛书出版。)

的梦笔生花与一唱三叹,及以一种传奇式的笔法演绎了一个在肉体上极为孱弱却在精神上极为刚毅的末世之子、孤胆英雄反抗命运的悲剧生涯等,这些或许都不是一个平淡的作者所能猝然可及的。尽管书中仍有一种不易道清的趣味使其难以成为一部纯粹的著述,但它为自己所选择的叙述方式却足已保证它突破一般学者评传与人物研究的种种局限,从而将此前的学理性诠释推行为更富大众阅读色彩的文本。

当然我们从《20年》中看到的无疑应是更多的东西,以致能再次与90年代以来的反思轨迹有了某种沟通。但是这种反思是有一定的方向性选择的,在陈寅恪这一个体身上所显示的并不主要是那种泛泛而论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如中西文化、雅俗文化、甚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而是学术或文化与意识形态于特定时空发生的真实冲突。其中固然还有更深一层的蕴义是需要得到解释的,然而这种纠葛恰好与20年社会基本问题构成的主要性状是相一致的。藉此,也当是更为深邃的一种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落实到具体人物的身上,则是抓住了陈寅恪事件(后20年)意义的核心。或许我们还很难排斥陈寅恪所一生携往的作为文化遗臣的成分,然而,从他20年的如实遭遇中透露的却主要还不是诸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文化内部关系之间的磨擦,即便这种磨擦仍然埋藏在经由某种意义转换可以表明的也就是次一层的概念区域中。无数具体事件的一一描出,首先使我们领会的便是这20年世事纷纭的切实面貌及矛盾激荡的真确核心。

这样也就事实上将陈寅恪的经历置于了与更为广大、强大力量的对峙之中。在书中,这种力量常常是通过一些现实存在的人物与事件反映出来,但总起来看又是很朦胧抽象的,某种观念的执有成了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行精神与肉体暴虐的普遍权力。作者将陈寅恪描绘为一个与当时社会时尚难以格入、也不愿格入的“纯粹”的学者,在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满怀热忱地趋向“革命”,使学术附会于政治与使学术“革命化”的时代里,他却不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甚至直接抵制政治对自己学术及其活动的侵入、干预,而去研究两个只有在古籍里才存在的婉孌女子。这并不表明他对当代政治的具体内容持有有什么明确的异议,正如早年他要摆脱三民主义的“俗谛”那样,只是想保持自己学术的独立品格,即所谓水自各流,“河水不犯井水”是也。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执拗的对个人空间与文化空间的真诚维护在陈寅恪所处的20年中只能是一种幻

想而已。通过陈寅恪随之而来的种种际遇,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对待当时政治的方式,尽管在姿态上是深沉的,但在理解上却是天真的。同时也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怀抱有如此的天真,故而才有超出众人的抵御时流的自信与勇毅。尽管有学术声誉、身体残废等的几重保护,及来自于政界要人的有力外护,陈寅恪则仍然没有能够摆脱政治斗争从外部对他的不间断侵袭,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模式并不会因为对它的漠然无视或敬而远之而放松对超出其外的任何一个灵魂的干预。超出陈寅恪想象的反而是,越是想要远离于它的阴影,则恰是违背了它的统一性意志的要求,因而在一种于当时被视为正常的逻辑上讲就越是需要接受意识形态风暴的洗涤,所谓力争“独立”的学术恰好成了被正当干涉的最合适对象。作者对陈寅恪后20年经历的完整描写,使我们看到了一方面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风浪的袭击,另一方面是随着精神折磨的重复及个人肉体衰老的加剧,即来自于内外两方面的不断盘剥,一颗力争独立的不屈灵魂日趋消蚀的过程,在与那种广泛的势力的较量中,最后不是玉毁于刚劲的拼搏,而是熄灭于完全丧失抵御能力的衰竭。相比较而言,这样的结局是更令人黯然神伤的,而这恰恰又是对五六十年代那一部分最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

陈寅恪不仅仅是一尊偶像,更重要的还应是有关他的故事里所包含着的多方面启示。其中之一便是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如何对待知识个性、学术个性及思想自由的问题,同时,它也是与对待生命尊严的问题完全联系在一起,落实到具体的职业类型上也有称之为是“知识分子问题”的。陈寅恪的事例再次展示了革命可能所具的二重性,即当我们把革命的方式不是限制在一种恰当的范围之内,而是将其推向极端,推进到一切层面,以“不断革命”、“彻底革命”来解决社会驱动、社会进步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走向正义的反面,并摧毁了一切平静、自立等方式存在的事物的价值。陈寅恪的悲剧恰恰发生在以“革命”的名义来无限制地推行某种理念,而这种理念又被大多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真诚与狂热地奉为正义的所谓革命的时代,这的确是意味深长并很值得反当的。

在与巨大的对峙力量的交涉中,陈寅恪的自信或勇气来自于他早年题写于王国维墓碑上的那句话,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该书所涉的内容远较这一主旨丰富,但传记作者以此线索来编织陈氏后20年的抗争经历并昭示陈寅恪精神的实质性内涵,而不

## 每月书评

是简单地演绎成“传统与现代”冲突的个案故事,可说是恰如其是。除了他所直接迎战的种种外部势力之外,这20年中单单专情于两个往逝之女子,即其所云“著书唯剩颂红颜”,均是以残生来推演这一豪迈的宗趣。后者的意义往往为人忽视,但透过种种烦琐的论证,我们仍然可以窥见其中的隐迹,如论《再生缘》,赞“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甚至推言其文体:“《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如释证柳如是之事迹,则谓其“罕见之独立女子”,又言及倡因:乃“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些,与他给科学院的答信中所云之“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由此可知,陈寅恪不仅视学术为一种“自由”思想的形式,也试图于学术的内容中来阐扬这种自由的精义,而于此二者,他几乎是将20年的全部生命体验都注入了其中,并构塑了他自己所属的那一寓言。

那么,余下的问题必然是这一信念的来源是如何的。正如该书所喻示的,没有后20年的经历,就不会有一个完整的陈寅恪,特别是能给予我们如上重大思想启示的陈寅恪,或许只能以一个国学大师的称号终其一生。然而一切思想都会有它的来源,这一事实也会使我们去作类似的推断,如果没有前60年的经历,同样不会有完整的陈寅恪,特别是不可能持有后20年持有这样一种特殊信念的陈寅恪,以致使他的信念成了一种无源之水。显然,将这种凭借于自由意念的抗争精神简单归之于对传统或文化的信念是一种观念对位上的误释,由于写作体制或其他原因造致的局限,《20年》一书在这方面透露的信息当然也就是很稀薄的。然而这又是一个为陈寅恪后20年经历深深打动的读者总是会在掩卷之后想要进一步向前探望的,由此也才能触及到陈寅恪一生思想的深层内核。

在其他学者所提供的关于陈寅恪早岁的资料中,这一轮廓开始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描述。总起来看,陈寅恪主要地还是将自己看作是近代启蒙与现代启蒙的一个十分自觉的传承者。尽管于世纪之交的大变局中,他在对待社会变革的策略上属于如汪荣祖已云的“稳健而开明”的一派,在学术思想上既立足于旧学的立场,又表达了对世界开放的襟怀,是为选择了激进与保守之外的“第三条路线”,但在与之有关的另一观念层面上又始终与第二代启蒙学者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保持

着相当的私谊与精神上的联系。他与胡适的关系即是明显的一例,从中(见汪荣祖《胡适与陈寅恪》)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同样不断地在一生中对自由的意义作强调演述的学者之间的默契并不像《20年》中以文学手法所讥讽式地隐喻的那样充满了某种结构性紧张,相反倒是该书真实记录下的刘节的那段话:“批胡适搞坏了学风”、“批判胡适也就是批判四十岁以上的人”间接地揭示出了陈胡二人于观念方向及于新的历史困境中所受遭遇的一致,虽然有巨大的空间跨越,但academic freedom(见傅斯年所记陈氏于庚辰在重庆支持胡适的演讲)却仍在两位学界骄子之间编织了一条隐在而常固的纽带。陈寅恪生平有两次激烈地表示自己思想立场的时刻,又正好都发生在最高研究院人选的问题上,尽管处身于不同的时代(一在国民政府时代),但其表述的态度却几乎是不曾更改或完全一致的,后者之源于前者并始终不变,这或许也是陈氏“与天壤而日久”一辞的自我承许?由此,随陈寅恪事迹渐次展开的冲突便自然展示为一种启蒙与反启蒙的冲突。

的确,陈寅恪在各个方面都更像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然而,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他的学术无论从立场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是有其特定价值之指向的,这就是其所表彰的“独立”与“自由”的内涵。学术自由不等同于政治自由,但这一概念单单从学术的意义上是无法自证的,因为学术自由总是和学术载负者的生命形式联系在一起,同样,academic freedom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并非是传统文化的精神主旨,而是近现代启蒙总体目标的一个深入侧面。也只有有这样的一种理解中,我们才有可能找到陈寅恪学术追求的准确定位,正如当时的批判者们所常常据之以理的,不关心时势或试图置身于时势之外本身也是一种与政治相关的态度,“纯粹”之学者背后必有支撑其纯粹的那种理念,就此而言,他也就很难再次成为一个摆落了任何思想干系的纯粹的人。

将陈寅恪故事在进一步向前延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形象所负载的更为丰富的具有百年沧桑的意义,也正因此它又获取了可向后扩展的意义。但不管怎么说,它只是这一历史进程中能够足以表呈某一侧面、特别是知识分子自身经历的范例之一,甚至于可说是相当孤独的范例。即便从《20年》一书的载录中,我们也能看到其他的知识分子所走的却是一些很不相同的道路,为此,我们有理由期盼更多的有历史启示意义的学者传记能在不久的将来问世。